

生物醫學道德增強何以剝奪了 有德之人的本質？

How Does Biomedical Moral Enhancement Undermine the Essence of Virtue Cultivation?

么欣欣 王福玲

Yao Xinxin and Wang Fuling

Abstract

Jason T. Eberl and Matilda Ajibola's paper shifts the discussion of moral enhancement from abstract debates about moral permissibility and moral value to a cautious analysis of the feasibility, effectiveness, and potential risks of moral enhancement technology based on the current stat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This paper provides a response to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we can biotechnologically construct a morally

么欣欣，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博士研究生，中國北京，郵編：100872。

Yao Xinxin, Doctoral candidate, School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China, 100872.

王福玲，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副教授，中國北京，郵編：100872。

Wang Fuling,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China, 100872.

《中外醫學哲學》XXIII:2 (2025 年)：頁 141–14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23:2 (2025), pp. 141–145.

better human: it is impossible for biomedical moral enhancement to shape a “virtuous person”, because it bypasses the reflection, practice, and struggle that are necessary for the cultivation of virtue and thus fails to fulfil the fundamental criterion for moral subjectivity. However, while traditional methods can help individuals acquire genuine and stable virtues, both biotechnological interventions and traditional education may face the same dilemma: the difficulty of truly accessing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individual moral subjectivity while promoting external norms.

埃貝爾與阿吉博拉的論文《我們能通過生物技術構建道德更為完善的人類嗎？》以美德倫理學為視角，對生物醫學道德增強的可行性、有效性、內在局限與潛在風險進行了系統分析。作者更傾向於支持“間接的”道德增強路徑，這一立場與亞里士多德的觀點相契合。不過，作者同時指出，生物醫學道德增強在某種意義上能夠克服道德意志薄弱的問題。因此，作者也在一定程度上為“直接的”生物醫學道德增強提供了辯護理由。總之，生物技術是否真正能夠構造一個道德上更好的人，我們依舊需要保持高度警惕與反思。

論文標題提示了作者的思考重心：問題不是“應不應該”進行道德增強，而是“是否能夠”通過生物技術造就一個道德上更好的人。道德增強問題的討論最早可以追溯到 Julian Savulescu、Ingmar Persson 與 Thomas Douglas 在 2008 年 *Journal of Applied Philosophy* 的同一期發表的兩篇論文。之後便引發了大量關於道德增強之道德正當性的繁雜爭論。這篇文章在某種意義上避開了這些爭論，而是回到了一個更為根本但尚未被充分澄清的問題：生物醫學手段是否真的能夠觸及道德的核心結構，從而產生真正意義上的道德提升？這一追問既是對技術可行性的反思，也是對道德本質的深層探討。

“道德上更好的人”是一個相當模糊的表達，不同的倫理學傳統對“更好”的理解亦有所差異。作者從美德倫理學的角度討論，這裡的人應該被視為具體的、獨立的個體，而“更好”則是指使某

一個體的道德狀態優於之前的狀態。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並未涉及更宏觀的議題，如通過技術提升整個人類的道德水準，或改造人性本身的道德結構——這些討論牽涉到“何為人類”“何為人性”等形而上學問題。

總體而言，我們認同作者的立場，我們同樣更傾向於通過“間接的”道德增強來提升個體的道德水準。原因在於，道德並非是一個可被分割出的抽象能力，而是我們人格結構的核心維度，是與他人建立意義關聯的方式。因此，任何試圖通過技術手段直接作用於情緒或行為傾向的做法，都有可能割裂道德與生活世界之間的內在聯繫。

事實上，我們觀察到許多人之所以不願意從事道德上正確的行動，並非源於其道德品質的缺失，而是因為外部環境的限制以及個人的價值權衡。在很多情境中，堅持道德行為可能會損害自身或與自身具有親密關係的他人的利益，甚至危及行動者的根本生活計劃。在這些複雜情境中，道德規範對個體的約束力如何發揮作用，取決於個體如何理解自身、如何理解與他人的根本關係。不道德並非簡單地意味著“這個人是壞的”，而是源於多種社會、心理與價值衝突的交織。道德認知與道德情感都伴隨著生活經驗與人生階段的發展而成熟。只有在不斷經歷價值衝突、在面對道德與其他重要生活目標之間的抉擇時，人們才逐步形成對道德的深刻領悟。

正如作者所說，道德提升體現為一種“鬥爭”，我們既需要體會到不道德的吸引力以及在現實生活中堅守德性的沉重壓力，同時也需要通過不斷地反思與實踐磨煉，不斷追問自己為何要抵制內心中的一些邪惡念頭和不必要欲望，為何在一個不完美的世界中仍要按道德行事，這才能真正理解什麼是道德上更好的人。

從這個意義上說，亞里士多德的美德倫理學與儒家倫理學在深層結構上具有驚人的相似性。例如，孟子的“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

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王陽明的“知行合一”“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傳習錄》）它們所強調的正是德性養成必須在生活實踐中完成，而非通過外在技術或單純的認知輸入即可實現。德性不是被“教”出來的，更不是被“製造”出來的，而是行動者在充滿衝突的具體情境中不斷做出抉擇、不斷承擔後果、不斷理解自我與他人之間的道德關係這一過程中生成的。

也正因如此，如果生物醫學道德增強只能作用於情緒調節、衝動抑制或行為傾向這類單一層面的能力，那麼它所能達到的便只是一種“行為矯正”或“心理修復”。它最多可以在治療意義上幫助某些人在特定領域減少不良行為，但難以觸及德性的本質。

不過，儘管作者在文章中強調傳統的間接道德增強更符合德性的生成邏輯，但這一立場本身仍需進一步檢視。基於家庭和社會道德教育培養的道德品質雖然具有穩定性，但是每一個人從一出生都得需要從零開始接受道德教育。可是，經過人類歷史幾千年的道德教化，人類社會的道德進步更多體現在法律、制度和行為規範的設定和完善，從康德式的視角看，人類的“善良意志”並未表現出明確的歷史性進步。人類社會仍充斥著大量的虛偽、自欺與道德冷漠，以及各種各樣的道德懷疑論。因此，如果間接道德增強無法顯著改善動機層面的道德困境，那麼它是否真正能夠作為生物醫學增強的替代方案，便值得進一步討論。換言之，無論是技術干預還是傳統教育，都可能面臨同一難題，即如何在外在規範提升的同時，真正觸及個體道德主體性的內部。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 埃伯爾·阿吉博拉：〈我們能通過生物技術構建道德更為完善的人類嗎？〉，
《中外醫學哲學》，2025年，第23卷，第2期：頁85-113。Eberl,
Jason T. and Matilda Ajibola. 2025. “Can We Biotechnologically
Construct a Morally Better Hum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23(2): 85-113.
- Douglas, Thomas. 2008. “Moral Enhancement.” *Journal of Applied
Philosophy* 25(3):228-245.
- Persson, Ingmar, and Julian Savulescu. 2008. “The Perils of Cognitive
Enhancement and the Urgent Imperative to Enhance the Moral Character
of Humanity.” *Journal of Applied Philosophy* 25(3):162-177.